

以文化转向作为切入点

文化语境

文化研究

文化认知过程

文化转向的由来

萧俊明 / 著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化

→ 转向的由来

——关于当代西方文化概念、文化
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考察

◎ 萧俊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文化转向的由来

——关于当代西方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的考察

著 者 / 萧俊明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65286768

项目经理 / 王 静

责任编辑 / 薛铭洁

责任校对 / 李临庆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1.75

字 数 / 258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90-228-9/B·016

定 价 / 26.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写一部关于文化的书，尤其是关于西方文化的书，是我由来已久的心愿。曾以文化人类学作为切入点，写过几篇文字，但总是感觉局限过多，难以从总体上窥度西方的文化历程。于是心中的那个愿望渐而演化成一个“宏愿”：想做一个全面考察。老实讲，设定这个目标时有些不知深浅，一旦考察付诸实施，才知力所不逮，几次想中途罢手，却欲罢不能。

也许，是因为那个愿望太过强烈，驱使我一步一步地走下来，最终走到一个可以止步的地方。换言之，所谓全面考察不过是一个奢望，我只是给自己划定了如书名所示的三个范围，限定了空间，才得以弥补自己的学识浅薄。尽管如此，见肘之窘还怕难以掩饰呢。

至于“文化转向的由来”，其实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正题，我只是想借助考察西方对文化的探索过程来提供有助理解这一转向的背景材料，而与转向本身并无直接的逻辑关联。坦白地讲，本书无意去回溯转向的历史过程或探察其发生机制，不过是以转向作为引子，进而去勾勒西方学界的文化心路。

说到“文化转向”，不妨再赘述几句。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言，20世纪曾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向，从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后现代转向，直至文化转向。从案头的资料来看，文化转向发生在过去的20年间，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过，文化转向的萌动似乎应该更早一些，可追溯至三十多年前。当时，已经

有人预言说，“我们的时代可能是人类经历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处在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过渡时期，我们确确实实濒临整个人类状况的伟大转变”。^① 越过这个关头，迎来的是一个文化的时代。

这就是说，人类的物质条件达到相当水平时，更需要精神、道德和审美价值来维系一种平衡，因而对于文化的渴求便成为人类的必然需要。当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后工业热情让位于 90 年代和新千年的后现代焦虑时，当经济和政治的乐观主义让位于环境和人文的悲观主义时，对于文化的认识已经开始深化，文化转向已经悄然发生。以往，文化始终处于边缘，而此时文化已逐渐成为中心。文化，如同经济、政治、技术和宗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无不受到其影响，甚至是深刻影响。这样一种见识是否意味着统治人类思想乃至行为达数百年之久的经验科学将告以结束，以往对于世界的认识要被新的认识所取代？更重要的是，这是否意味着人类正处在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关头，而这个时代的驱动力是否更多地源自文化？

诚然，本书的目的并非要直接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要发掘其产生的原因。确切地讲，西方学界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认知过程才得以实现其文化转向，或者说文化转向是在怎样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于是，文化概念、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便成为考察对象。

关于考察的整体设计，我将在第一章详细论述，这里只想做另外几点说明。

我的主要目的是想写一本适合中国学者需要的书。尤其对于研究文化的学者来讲，他们更需要的也许是关于文化的不同见解，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于是，凭借多年从事人文科学译介工作的经验，在阅读了大量西方相关著述之后构想出这样一个框

^① 麦克黑尔，J.，《未来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Future*，New York：George Braziller），1969，第 47 页。

架，朦朦胧胧填充了不少读书随感，怕是让人见笑了。

不过，我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至少就学术领域而言。所以，说是随感，并非胡乱发些议论，而是在读解西方著作的基础上进行“重写”，其中重“述”而不重“评”，但“述”并非单纯的“述”，至少在一定意义上包含着我对某些观点和论题的理解和重新解释，也就是说，在某些观点和问题上，作出判断进而决定是否认同是困难的，不如以准确的理解选择更有借鉴意义的见识加以重述，这样“评”也就在其中了。

我始终认为，介绍西学应以文献价值和信息价值为着眼点。本着这样一种理解，我在主要参照西方文献的同时，亦找来国内相关著述加以对照，一是为了避免无意义的重复，二是为了比照出一些不同的有新意的见解，尤其是一些与国内流行见解形成明显反差的论述，我更是格外注意。这样做颇为费事，却免去一些乏味的“老生常谈”，也是文献和信息价值之所在。

参照西文文献，一般不可避免地要大量转述西文文本，因而容易流于编译的模式。这是一个让人颇为头痛的两难，如若大段转译，则有抄袭之嫌，且“生硬”和“断裂”处甚多；如若完全是自己“原创”，其难度可想而知，功力不逮者往往以一知半解而自鸣得意。我想，解决这样的两难，应该是没有什么捷径可寻，最好的办法还是“旁征博引”。具体而言，在论述某一论题时我尽量不以某一单一文献作为蓝本，而是阅读多个相关文本，反复对比再三斟酌之后再行叙述。即便如此，似乎仍不乏翻译痕迹，拗口之处更是在所难免。当然，切入点的选择，整体思路的设计以及叙述结构的排列是无从“援引”的，我只是以“多维”的方式取材于西文文本。

附带说明一下，我在附录部分所列的文献目录并不全部是已经掌握的一手材料，有些是主要参考文献中援引的。对于这些转引文献，我视其重要程度尽可能找到原著，以免断章取义之嫌，除个别我认为无须上下文也不会造成曲解的，我均对原著进行了

重读。另外，有些引证文献已有中文译本，但有的译本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故此，在引证时，除已有得到普遍认可译本的经典之外，我均根据原文自己译出，若有误译，敬请读者批评斧正。

最后，我要特别提及的是，本书的完成得益于所在单位领导和学界前辈的鼓励和帮助，他们给予我学术上的指导、宽松的工作空间和资金上的支持。黄长著先生阅读了全部书稿，做了多处批改，指出了不足之处，并给予了令我愧不敢当的赞扬。李惠国先生阅读了全部书稿，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和赞语，让我感到前辈提携后进的宽容。黄育馥女士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始终作为我的第一位读者阅读了全部初稿，就若干问题多次与我商榷，以弥足珍贵的坦诚给予了建议和指教，并在《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刊登了初稿多篇。陆象淦先生和王静女士在本书的出版上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照顾。在此一并致以由衷的谢意！

无论如何，我了却自己的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自己认为还算有意义的工作，借此自慰而已。

2003年7月于北京香山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化概念的语境与来源	1
一 跨学科性与语境	1
二 文化概念的来源	12
(一) 文化概念的哲学来源	12
(二) 文化概念的文学来源	15
(三) 文化概念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来源	20
三 文化理论的兴起与英国文化研究	24
第二章 文化与符号	37
一 关于符号性的当代研究	37
二 符号性：文化的根基	38
三 符号与记号：界定意义	40
三 符号性研究：人类学家的观点	47
(一) 形式方法论	47
(二) 拒斥形式主义：符号人类学	50
第三章 文化与社会结构	56
一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观点	56
一 文化观的差异：符号性与符号学	56

二	人类学传统中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60
三	文化模式理论	62
四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社会结构	65
五	马林诺夫斯基与文化人类学	67
六	关于文化与社会结构关系的新观点	68

第四章 文化与社会行动

——韦伯的文化思想及其发展		74
一	韦伯的方法论及其文化内涵	75
二	文化构成与价值关联性	81
三	韦伯的文化分析	86
四	舒茨与帕森斯：韦伯文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89

第五章 两个传统的比照

——功利主义与文化主义		95
一	功利主义	96
(一) 功利主义的文化矛盾		96
(二) 功利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明		101
二	文化主义传统探源	104
(一) 阿诺德与英语学的兴起		105
(二) T.S. 艾略特		109
(三) F.R. 利维斯		111
(四) 利维斯主义与文化主义的兴起		114

第六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文化理论

一	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问题	119
二	与传统理论决裂：批判理论的缘起	125
三	启蒙的辩证法：批判理论的历史观点	128
四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	134

五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解读	145
---------------	-----

第七章 文化解构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153
一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划界	153
二 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消解形而上学传统	155
三 超越二元对立	160
四 方法与反方法之间：解构之谜及其社会和文化批判意义	165
五 文化解构的基本假定	171
六 文化解构引出的疑问	182

第八章 后现代话语

——梳理与辨析	186
一 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	187
二 后现代话语的代表人物	195
(一) 哈贝马斯：未竟的现代性工程	195
(二) 利奥塔：对于后现代性的肯定	197
(三) 詹明信：对于后现代的历史语境化	200
(四) 博德里亚：“幻象的超现实性”	205
三 后现代的窘境：理论的贫乏与方法的翻新	210

第九章 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上）

一 文化研究的起源与初期阶段	219
二 文化研究的制度化与范式危机阶段	226
三 文化研究中的“葛兰西转向”	231
四 新葛兰西派的理论贡献——接合理论	238
(一) 接合理论的产生与演化	240
(二) 霍尔对接合理论的发展：差异中的同一	246

第十章 文化研究的发展轨迹（下）	258
一 文化研究的多元化时期：文化循环	259
二 文化平民主义与通俗文化	268
（一）通俗文化概念辨析	268
（二）通俗文化研究的演化	274
（三）文化平民主义与通俗政治	278
三 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转向	292
注 释	304
西文参考文献	336
人名索引	353

第一章 文化概念的语境与来源

关于文化，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普遍一致的定义，也从未产生过完全令人满意的定义。因此，无论在社会科学领域抑或在人文科学领域，文化都可以说是一个疑难。尽管从词源学上来讲，文化一词的含义可以溯源于远古，但是对于文化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只不过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事情。一个多世纪以来，欧美学者为寻求文化的“标准”答案而殚思竭虑，却每每不尽完美。无论是百科全书的定义，还是各学科的定义，都无法对文化做出“权威性”的定位。难怪英国人类学家 R. 威廉斯在对文化进行了几十年潜心解读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英语中有两三个最为难解的词，文化即是其中之一。”^[1]当然，威廉斯并不是单纯提出一个语义学问题，也就是说，文化概念的疑难并不在于这个词的词义，而在于文化本身的模糊性、不精确性以及不确定性让人难以把握。在认识和界定文化上，欧美学者的问题恰恰出在他们的学术传统上。

一 跨学科性与语境

历史地讲，现代大学的诞生将研究工作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形成了各门学科。这种学术研究模式在自然科学方面确实很有建树。然而，如果把自然科学的一套搬入人文领域以图解决文化的不精确性和不确定性，难免要走弯路。事实上，欧美学者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内始终在实证主义的阴影下进行研究。尽管他们在文化问题上不时提出新的见解，但总是摆脱不了自然科学方法的束缚。

尤其是在 19 世纪，新生了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科，其中有些学科将文化或文化的某些方面作为其研究领域。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等等都闭门于各自的学科从各自学科的视角对文化概念做出界定。但是各门学科在解读文化概念上都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这些学科各有各的主见，却很少有沟通与交融。更糟糕的是，每个学科都想以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文化这个疑难。其实文化的蕴涵与构成决定它不可能为任何一门学科所独有，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独自承担起文化概念的“统一大业”。

所以说，欧美学者一开始便在“路径”上出了问题，他们非要把一个多学科或跨学科现象领入一个单一学科来解决。其结果往往是以偏概全，见树不见林。而每一个文化概念都无法被判定为正确或错误，因为各自至少就文化的某一方面说出了一定的道理。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可是欧美学者却囿于各自的“门户之见”沸沸扬扬地吵了一个多世纪，不仅学科之间吵得不可开交，学科内部也争执不下。在文化问题上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流派，文化概念的解读变成了文化论争，文化概念也就更加显得扑朔迷离。

直到 20 世纪后期，一些学者终于醒悟过来，跳出了自己的学术圈子，摆脱了学科的束缚，开始对文化概念进行跨学科的和全方位的探索。关于文化的界定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方位的趋向。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个比较。英国著名人类学家 E.B. 泰勒 1871 年提出的文化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综合整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任何能力和习惯”。^[2] 而 C. 詹克斯 1993 年提出的文化定义则把文化分为四个层面：（1）文化是一个认知范畴；（2）文化是一个集

体范畴；（3）文化是一个描述或具体范畴；（4）文化是一个社会范畴。^[3]

从这个比较可以看出，泰勒的定义完全局限于人类学的范围，只是给人类学设定了一系列研究科目，或者说是建立一门文化学科。应该说，泰勒的定义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泰勒所寻求的是一般性的典型文化，这样的文化只是从许多个别的真实文化中抽离其共相而得来的观念，因此仅在理论上存在。以后所产生的种种理论流派共有的一个通病就是把文化划归为某个抽象的概念，如“进化”、“传播”、“功能”、“结构”等等。詹克斯的定义则截然不同，他已跳出学科的圈子，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文化概念进行了梳理。他在整理和归纳文化概念时显得极为谨慎，既未将文化概念系统化做出等级分类，亦未做出抽象的概括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詹克斯的文化定义反映了当代学者对于文化的认识趋向。

T. 奥沙利文主编的《传播与文化研究中的关键概念》中对文化所做的解释更加明确地表现出了这种认识趋向：文化一词是多概念的，它可以在许多不同的话语中使用。这意味着不可能将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应用于任何语境，必须要做的是鉴别话语语境本身。这个话语语境可以是民族主义、时尚、人类学、文学批评、葡萄栽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甚或常识。在任何语境中，文化的意义都将根据它在这个话语中的特定所指来确定，而不是根据任何可以被永久地锁定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固有或自明的特质来确定。^[4]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学者对于文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切性已有了充分的认识，不再去追求一般性的典型文化。

在此之前，也曾有学者试图对文化概念进行整理和归纳。例如，著名文化人类学家 A. 克罗伯和 C. 克拉克洪分析了 1950 年以前的 160 多个文化定义，将它们分为了六大类：（1）描述性的；（2）历史性的；（3）规范性的；（4）心理性的；（5）结构性的。

的；（6）遗传性的。^[5]从表面上看，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对文化概念的整理和分类与詹克斯的文化定义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最后的结论是把文化看做成套的行为系统，而文化的核心则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个结论注意到了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但是他们所寻求的仍然是一般性的典型文化，其目的无非是沿循泰勒的路子为人类学确定研究对象。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他们认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结构或层面，有其自身的规律，因此有必要建立研究文化的独立学科——文化学。不难看出，克罗伯和克拉克洪虽然没有沿用“功能”、“结构”之类的抽象概念，却用“模式”取而代之。他们并没有使人类学研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替换了一种研究方法而已。

在克罗伯之后，对文化概念进行整理和概括的不乏其人，但是西方学者对文化进行定义时则显得慎之又慎，不肯轻易做出结论。R.H. 温思罗普在《文化人类学概念词典》中提出的文化定义就是一例：“（1）近代人类所特有的、对于其适应方式是至关重要的种种能力；（2）习得的、积累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物；（3）一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所特有的思想模式、行动模式和价值模式；（4）二战之后产生的一系列互不相容的概念。”^[6]

通过这种反复比较，可以看出跨学科性已成为认识文化和研究文化的一种趋向。罗兰·巴尔特这样说，“跨学科研究在当今受到了广泛的讨论，它面对的不是已经形成的学科。从事某种跨学科研究，如果只选择某一个论题，集中于两三门学科，是不够的。跨学科研究是要创造一个不属于任何一门学科的新对象”。^[7]从巴尔特的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出詹克斯的用心所在。我们不去评判詹克斯的定义是否全面准确，只是说其重要意义在于给我们指出了把握文化的路径。我们不敢说这条探索进路正确无疑，但是最起码可以起到借鉴作用。

西方学者非常形象地把文化比做一棵大树，神话、宗教、伦理学、哲学、宇宙学及美学构成了它的根，经济和军事体系、技术实践、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环境政策以及消费实践构成了干和枝，教育制度、文学作品、艺术品、精神信念、道德实践以及其他构成它的叶、花和果实。^[8] 公允地讲，这个隐喻是不足取的，这倒不是因为它以一种整体论的观点去看待文化，而主要在于这棵“大树”颇有“箩筐”之嫌，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不过，它给予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这个隐喻的启迪作用在于对文化的探索可以仿照“顺藤摸瓜”的思路来进行。具体而言，我们不妨从两个层面和四条进路来达到对文化的整体把握。

所谓两个层面，是指理论和概念的层面与应用和实践的层面。这样区分文化并不是要把文化纳入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轨道，而是要强调作为概念的文化与作为现实的文化之间的差别决定我们要从不同的进路去把握文化。作为概念的文化大体上是指理论、观念和定义中对文化所做的探讨，或者说是学者和理论家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与此相比照的是应用和实践领域中发展起来的文化，也就是文化在制度化实体中——如政府、公司、教育机构——以及在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的文化生活中的体现与意义。有了这样一种语境设定之后，便可以根据不同的文化对象采用不同的进路。

首先是理论进路。概括而言，它探索的对象主要是通过逻辑、观察、应用和分析等多种方法，或者从形式、过程、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结构等多种视角对文化进行的概念建构。它的主要作用在于可以扩大和深化我们对于文化现实的认识和理解，但其明显的不足，一是容易将文化套入一种理论或概念模式而与现实相去甚远，二是由于理论家之间的论争而让人们对文化的定义无所适从。概念进路主要是借助学科的分类构架对文化概念进行梳理，它可以帮助我们按照学科分类对文化进行图书馆式的“检

索”，却也由于学科本身的局限性而无法把握文化本身复杂的相互关系。

与理论和概念进路形成对照的是制度进路和实践进路。制度进路的着眼点是诸如政府、公司（文化产业）、教育系统等机构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这些界定一般是为了比较具体的行政、政策、计划乃至商业目的而将文化限定为比较狭义的文化制品或文化产品，如艺术品、文化遗产以及出版、广播、电视、电影、音像等文化产业的产品，因而往往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实践进路的着眼点则落于人们在公共和私人话语中对“文化”一词的使用，其中包括在非学术性文章和书籍中对文化一词的使用。日常话语中的文化概念往往不甚严格，因而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歧义性，容易造成混淆和误解。尤其是一些经过延伸的文化概念，如饮食文化、园林文化等等更是加剧了文化概念的模糊性。这类概念告诉我们，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理解中，并没有明确的限定范围，而是渗透于全部人类生活领域乃至整个自然领域。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欧美学者在探索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在摸索通达文化的进路，尽管其间出现了许多偏差，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去全盘否定他们的文化研究，而是要去借鉴，取其所长，补己所短。进一步讲，我们不必过多地去评判每一条文化定义的正确与错误，而应更注重它产生的背景与语境。因为每一条文化定义都是有具体语境的（context-specific），每一条文化定义都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对文化的理解。只有借助具体的语境我们才可能把握每一个文化概念的确切意义和适用范围，进而对西方文化研究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就本书的目的而言，无疑是以概念和理论的层面作为基本论题，实践和应用的层面则不在探讨的范围之内。沿着这个层面我们进一步去寻找和划分作为概念的文化的语境，也就是说语境化是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因为对于文化的任何解读都不可能脱离其“文本”和语境。具体而言，重要的语境有三个：